

以意逆志诠释史研究

杨红旗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从孟子提出以意逆志命题到当下的各种以意逆志命题诠释这一历史经验整体来看,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呈现了语义拓展、边界限定与逻辑建构的诠释历史进程与经验结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显示了汉语语境中存在一种可以称为以意逆志诠释学的学术传统,经典建构、伦理对话是其所具有的汉语文化与思想特质。

关键词:以意逆志;诠释史;以意逆志诠释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7)03-0151-06

与传统文化中其他重要命题一样,出现在《孟子》中的“以意逆志”命题一直为现代论者所关注。层出不穷的以意逆志新论、新释、再论、再辩等等论说题目,显示了对以意逆志这一传统命题现代意义的不懈追求,然而,这种对传统命题现代意义不懈追求的欲望与传统命题在现代语境中的命运呈现出复杂面貌。

一、被压缩的学术空间

整体上看,现代研究把以意逆志命题从传统文化背景与历史接受经验中剥离出来,纳入受西方文化影响形成的文学批评方法、接受美学或阐释学等观念背景中解读。其研究成果主要存在于中国文学批评史与比较诗学两个学科。

“正是从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始,传统的诗文评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意义,而批评史也才从文学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186}陈钟凡在1927年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周秦批评史”一章“孟轲诗说”题下提出:“其论诗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又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则注重文学背景及作者之旨趣焉。”^{[2]12}他开始把以意逆志命题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组成要素来加以研究,这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中国文学批评史凭借“文学”、“作者”、“文学批评”等现代

术语建构了研究以意逆志命题的学术范式。这种研究方式正是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概括王国维学术提到的“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3]248}。

“‘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4]108}以“近世文学之义界”、依据“远西学者言‘批评’之涵义”,参照“远西自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以来,迄于今日已独立之学科”的“文学评论”^{[2]5},从陈钟凡开始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中国20世纪现代学术建构的产物。它是一门古代的学问,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与文学批评相关联的材料;它更是一门现代的学问,因为它是以受西方文化影响生成的现代学科体系中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的结构方式去组织古代的材料。

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历史语境中,整理传统文化的现代欲望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内在动机,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学术方法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以意逆志命题的主要方式。

在此研究范式中,从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直到21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书写,以意逆志命题内涵或有差异,逻辑建构各有不同;但都是把以意逆志命题作为参证现代观念的传统材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书写使“文学”、“文学批评”、“文学批

* 收稿日期:2006-10-30

作者简介:杨红旗(1973-),男,四川安岳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文论与美学。

评方法”等观念合法化、术语普遍化。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中成为历史还原论题。“文学”等现代观念的西方来源被遗忘,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生成的中西比较论域被压缩。

比较诗学凸现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一直潜藏着的中西比较问题。随着对话语境的自觉与成熟,中西诗学比较成为以意逆志命题研究的新范式。“以意逆志与接受美学”等论题,“以意逆志是中国阐释学的开山纲领”等论说成为研究以意逆志命题的主要样式。

民族价值诉求与共同诗学追求的现代欲望使比较诗学研究成为诠释以意逆志命题的合法方式。这种现代欲望形成了比较诗学研究在本土立场上追求传统现代转换的学术空间,本土传统与现代价值的张力成为现代学者比较诗学研究的动力。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比较诗学研究中转变为现代转换论题。

立足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论者提出“在文学接受的本质问题上,中华古代文论是否也提供了一些真知灼见呢?这里就要进入与现代的‘接受美学’观念最为接近的‘以意逆志’说”^{[5]234}。“这里我们想到80年代初期引进的德国20世纪文学批评的新理论‘接受美学’。那时我们觉得这理论真新鲜,真是一种‘原创性’的新发现。多少年过去了,我发现‘接受美学’就其思想而言,在我们中国‘古已有之’,接受美学的思想幼芽产生于中国。”^{[6]102}

以意逆志命题所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事实上出现在现代逻辑中重建古代面貌的悖论,以现代需要重塑传统形象的循环。无论是以狄尔泰体验论阐释还是与伽达默尔视野融合论比较,这种中西诗学比较就是用现代的知识观念去填充以意逆志命题,把它塑造为现代阐释学问题的萌芽。中西比较诗学求同的思路,决定了其论题与结论。无论把以意逆志命题论述为自发的阐释学观念萌芽,或是更完美的阐释学观念,其论说重复的仍然是类同性论说。

由于上述原因,虽然关于以意逆志命题的论说层出不穷,其论说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与比较诗学两个学科中依赖现代学术观念、方法、目的所形成的学术范式,是决定以意逆志命题内涵与价值的基本视域。无论是历史还原,还是现代转化,受制于现有学术范式的以意逆志命题研究,把以意逆志这一传统命题压缩为参证外来观念的材料,同时把外来观念压缩为真理命题;还把中西命题可比性压缩为

类同性。

在中西方文化的相遇中做学问,并非就不可以寻“同”(钱钟书先生一生都在寻“同”),而非要寻“异”。无论找“异”、还是寻“同”,都不是文化相遇研究的 Sachlichekeit (实处)。“异”就是“异”,“同”就是“同”,看到“异”抑或“同”,都算触到 Sachlichekeit。重要的是,要看到真正的“同”或“异”,不要搞错——为此往往需要在“同”中见“异”,或从“异”中见“同”,从而,更为重要的是,搞清楚寻“异”找“同”所依赖的划分尺度(Nomos)。^{[7]142}

以意逆志命题的研究,以现代观念为基础,分析、解剖传统命题,整体上呈现出从现代到传统的意义单向循环。“理解古典,就得回到古典的视域。在中西方文化的相遇中,中国与西方的古典相遇过吗?”^{[7]147}

二、以意逆志诠释史

把现代研究放在从孟子提出命题一直到当下研究形成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中来看,可以突破现代研究中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意义单向循环;研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可以从诠释史的历史经验中获得回到古典视域的路径。

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指的是自《孟子》成书以后直到当下众多以注释、阐发、批判、研究、运用等方式展开的命题诠释历史。孟子提出以意逆志命题是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历史的前提。

以意逆志命题是孟子在其时代语境中针对《诗》的命题,具有独断论性质,但却能上升成为普遍性观念。这种上升过程需要外在的机缘条件,但更离不开命题包含的思想智慧。《孟子》文本中“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命题,从形式上看,涉及到了理解现象的基本问题,是对理解现象的汉语命名。“以意逆志”、“意逆”、“逆志”等词组成为汉语中表示理解的专用词语。从内涵上看,孟子以意逆志命题的心性论域、伦理视野凸现了汉语文化中理解观念的基本特色,具有汉语经典命题的价值空间,成为后世关于理解问题的思考基点。

“‘以意逆志’只有在儒家人性论的渗透之下,在孟子‘求放心’与‘推此心’的思想结构中,才可能顺理成章地产生;这是儒家人性论在修身治学方面伸衍的必然结果。”^{[8]16}孟子强调“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而又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以心为目标又以心

为途径,以心求心是孟子学问修身的基本思想,以意逆志就是以心求心的方式。

可以说,孟子的以意逆志命题提出了说《诗》的方法问题,具有明确的方法意识。但同时,以意逆志命题言简意赅、文约意丰,以这种形式表达的方法观念,其具体内涵不是逻辑化界定、形式化定型。问题意识的明确性与命题内涵的模糊性统一在“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这一论断之中。也正是这种问题意识明确性与命题内涵模糊性的统一,使以意逆志命题成为关于理解问题的元命题。其问题意识被后来论者所接受认同的同时,其意义空间被后来论者所开拓扩展。

孟子提出的具有明确问题意识、方法观念与模糊语义空间、有限使用范围的以意逆志命题,在后世的诠释中出现三个历史关键点与主题侧重点:语义拓展、边限定与逻辑建构。

(一)以意逆志的语义拓展

赵岐与朱熹代表了从汉到宋的历史时期中,侧重语义拓展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第一阶段。赵岐、朱熹是在不断扩展以意逆志命题使用范围的同时,拓展以意逆志命题的语义内涵。

文辞与文意的距离问题使得赵岐追求以意逆志的解决途径,他提出:“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其言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后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说《诗》也。”^[9]深求文本之后的意义,赵岐关注以意逆志命题的“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9]。

将“以意逆志”释为“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自赵岐开始一直延续到朱熹、顾镇、顾颉刚、徐复观、周光庆等各个时代的论者。在此延续之中,以意逆志命题出现从己意以求与平心以待的内涵变化。比较赵岐所解“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与朱熹《孟子集注》所释“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可以看出,在认同赵岐诠释的基础上,朱熹进一步释“逆”为“迎取”。以对“逆”这一关键词的诠释为标志,朱熹扩展了以意逆志命题平心而待的语义内涵。

孟子说“以意逆志”者,以自家之意逆圣人之志。如人去路头迎接那人相似,或今日接着不定,明日接着不定,或那人来也不定,不来也不定,或更迟数日来也不定,如此方谓之“以意逆志”。今人读书,却不去等候迎接那人,只认硬赶捉那人来,更不由他情愿,又教它莫要做声,待我与你说道理。^{[10]3258}

董仁叔问以意逆志。曰:“此是教人读书

之法。自家虚心在这里,看他书道理如何来。自家便迎接将来,而今人读书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10]1359}

朱熹的上述诠释,在扩展了以意逆志命题平心而待的语义内涵同时,也建构了以意逆志读书法的新论题。读书是中国文化中常见的现象,“在理学家中,正式明白主张教人读书,却只有朱子一个”^{[11]153}。因为读书在朱熹的观念中位置非同小可。“朱子教人读书同时即是一种涵养,同时亦即是一种践履。朱子教人读书,乃是理学家修养心性一种最高境界,同时亦即是普通读书人一个最平坦的读书大道。”^{[11]159}

朱熹认同“《诗》、《易》之类,则为先儒穿凿所坏,使人不见当来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种功夫,直要人虚心平气,本文之下打迭交空荡荡地,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12]2219}。因此,朱熹主张平心以待的读书方法来反对己意以求的解文方法,但平心以待的语义与己意以求的语义都是从以意逆志命题形式中生成的。赵岐、朱熹共同开创了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的第一阶段语义拓展。他们对以意逆志命题的语义解释成为后世运用、理解以意逆志命题的核心内涵。

(二)以意逆志的边限定

顾镇与顾颉刚代表了在从清代到近代的历史时期中,注重边限定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第二阶段。顾镇、顾颉刚是在总结历史传统的视野中,设定以意逆志命题边界的。

针对朱熹建构的以意逆志读书法,顾镇首先把以意逆志说诗之法与读书穷理之法区分开:“书曰:‘诗言志,歌永言。’而孟子之诏咸丘蒙曰:‘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后儒因谓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又谓少间推来推去,自然推出那道理。此论读书穷理之义则可耳。诗则当知其事实,而后志可见,志见而后得失可判也。”^[13]

顾镇以孟子观念结构限定以意逆志命题,而提出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的结合。他在《虞东学诗》中论以意逆志,强调“夫不论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孟子若预忧后世将秕糠一切,而自以其察言也。特著其说以防之。故必论世知人,而后逆志之说可用也。”^[13]

顾镇的这种理解也正如焦循《孟子正义》,“‘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的结合,便有了一种理论的自觉,几乎成为清人解诗不言而喻的通则”^{[14]387}。清代论者开始了限定以意逆志命题的有效空间。

近代学者顾颉刚对以意逆志命题的诠释,认同从孟子观念结构与思想整体限定的方式,同时开始了一个新的方向。他是把以意逆志命题作为一种儒学产物的历史对象来加以限定。

作为整理国故的主力,顾颉刚作《〈诗经〉厄运与幸运》一文,后更名为《〈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编入《古史辨》第三册。顾颉刚认为孟子提出以意逆志命题,“这一番话实在很对。他说诗要探到诗人的心志里,可以见得他的精细。春秋时人说‘赋诗言志’,是主观的态度;他改为‘以意逆志’的客观的态度。有了客观的态度,才可以做学问,所以他这句话是诗学的发端。要是他在诗学发端的时候就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是何等可喜的事!不幸他虽会立出这个好题目,却不能达到这个好愿望。他虽说用自己的意去‘逆’诗人的志,但看得这件事太便当了,做的时候太卤莽了,到底只会用自己的意去‘乱断’诗人的志”^{[15]362}。

考察以意逆志命题,顾颉刚的根本目的就是“很希望自己做一番斩除工作,把战国以来对于《诗经》的乱说都肃清了”^{[15]310}。所以,顾颉刚将其放到从“春秋时人”到“我们”现在的历史整体中理解:

孟子能够知道“尚友论世”,“以意逆志”,对于古人有了研究历史的需求,确实比春秋时人进步得多了。但既有了研究历史的需求,便应对于历史做一番深切的研究,然后再去引诗才是道理。他竟不然,说是说得好听,做出来的依然和春秋时人随使用诗的一样,甚而至于乱说……他对于诗学的流毒,到了这般,我们还能轻易的放过他吗?^{[15]366}

顾颉刚是以历史现象结构与历史事件整体为基础,限定作为儒家学说产物的以意逆志命题的意义边界。

虽然顾颉刚与顾颉刚有着不同的知识背景与学术观念,但他们以孟子观念结构、思想整体或历史现象结构、历史事件整体的不同论域完成了对以意逆志命题的边界限定,是传统经学与现代史学的不同学术框架中对传统以意逆志命题的整理与反思。

(三)以意逆志的逻辑建构

徐复观与周光庆代表了现代历史时期关注逻辑建构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第三阶段。徐复观、周光庆是在遭遇西学的文化背景中,建构以意逆志命题的逻辑空间。与从外在寻求边界限定不同,内在逻辑建构是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现代方向。

徐复观对以意逆志命题作了系统的诠释:

所谓的“文”指的是用字,“辞”指的是由字

所组成的句,“志”指的是作诗者的动机及其指向,“意”是读者通过文辞的玩味,摆脱局部文句文字的拘限性,所把握到的由整体所酿出的气氛、感动、了解。由所得到的这种气氛、感动,以迎接出(逆)诗人作此诗之动机与指向,使读者由读诗所得之意,“追体认”到作者作诗时的志,这才真正读懂了,才可以说《诗》。孟子所提出的方法,是含有普遍妥当性的,由此可以了解他对《诗》所下的功力之深。^{[16]28}

徐复观把以意逆志命题解释为追体认、追体验的方法,并建构以意逆志追体验的文学欣赏方法。“若说到文学欣赏的过程,乃是一种‘追体验’的过程。‘体验’是指作者创作时的心灵活动状态。读者对作品要一步一步地追到作者这种心灵活动状态,才算真正上是欣赏。”^{[17]75}他又进一步提出:“把治文艺批评中的‘追体验’的观念、工夫,转用到治中国思想史的最后程序之上,是相对的恰切、必要的。”^{[18]175}强调“治思想史的人,先由文字实物的具体以走向思想的抽象,再由思想的抽象以走向人生、时代的具体。经过此种层层研究,然后其人、其书将重新活跃于我们的心目之上,活跃于我们时代之中。我们不仅是在读古人的书,而是在与古人对话。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庄生所谓‘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此乃真是九原可作,而治思想史之能事毕矣”^{[18]94}。

在文学的本质与特性以及文学欣赏目的与过程等论题中,徐复观建构以意逆志命题作为方法论的内在逻辑。这种建构实际上与其认同传统的新儒家身份相关,“徐复观在谈到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时,认为今人之弊,一是只在作品的周边材料下力气,不敢真正进到作品生命里面;二是‘常是把古人拉在现代环境中来受审判’,‘拉在强刑逼供,在鸡蛋里找骨头的场面中来受审判’。他因此而提倡修炼出一种‘与作家诗人精神相往来’的‘追体验’的功夫”^{[19]34}。

与徐复观侧重以意逆志方法的一般方法论逻辑不同,周光庆对以意逆志命题的逻辑建构,参照了西方理论,在知识认同的基础上建构起以意逆志方法的中国特色。

西方解释学正在引进的背景中,探讨中国古典精神学的独特个性,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提出:“孟子首倡的‘以意逆志’说,是中国古典解释学史上第一个具有自觉理论意识和深厚理论内涵的心理解释方法论。”^{[20]360}他从孟子的诗学背景与孟子本人建构的人学理论、诗学理论出发诠释以意

逆志命题：

“以意逆志”说，是孟子为纠正流行的“断章取义”、“以辞害志”等等错误解《诗》方法而创立起来的一种新的心理解释方法。这种心理解释方法，以“同类相似”、“人性皆善”因而应该“强恕而行”的人学理论为依据，以“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的语言解释方法为前导，激励解释者怀着自已先在的认识图式、期待视野等等“意”，以“以心揆心”的方式，以追溯推求的姿态，超越“距离”，设身处地，去探求和体验创作者隐寓在诗歌文本中的思想情感，尤其是他对社会生活、政教风俗的见解，在融合同化的过程中生发出新的意义。^{[20]360}

周光庆侧重孟子思维特色及其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效应等论题，其论说以意逆志命题彰显了民族特色：“孟子的人学思想，无论在理论上有多么片面，无论论证中有多么混淆，然而，在当时，在后世，它总是具有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他首创的‘以意逆志’说，也是以这种人学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同类相似’、‘强恕而行’的理论运用到以对话为根本的文化典籍解读过程中，就形成了‘以意逆志’的解释方法论。”^{[20]352} 中国文化传统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形成了理解的最高方式”^{[20]12}。

无论是应对西学而建构的以意逆志追溯体验方法，还是参照西学而阐释的以意逆志心理解释方法，在中西比较的语境中，现代论者都以体系化、民族化的不同方向共同建构了以意逆志命题的方法逻辑。

三、以意逆志诠释学

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呈现了语义拓展、边界限定与逻辑建构的诠释历史进程与经验结构。从孟子提出以意逆志命题到当下各种以意逆志命题诠释这一历史经验整体来看，汉语语境中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之为以意逆志诠释学的学术传统，这个传统应该、能够而且已经显示其言说能力。

(一) 经典建构

这个可以称之为以意逆志诠释学的学术传统，首先是从以意逆志命题在现代语境中拓展语义、限定边界与逻辑建构而显现出来。

在现代汉语语境中，以意逆志命题具有以自我之意迎取他人之志的语义内涵；在现代学术视野中，以意逆志命题是汉语文化传统生成的理解法则；在现代文化需求中，以意逆志命题是实现中与西、古与今对话的经典建构方法。因此，以意逆志

诠释学就是汉语文化传统影响下的以自我之意迎取他人之志而实现中与西、古与今对话的经典建构方法。

在语义拓展、边界限定与逻辑建构的诠释历史经验中，以意逆志命题具有经典建构的方法论意义。从这个意义上看，历代诠释者都是带着自己现实的问题，进入传统命题的思想世界，在传统命题中寻求答案，完成经典建构。因此，这里的传统命题不是作为历史陈迹的特殊命题，而是经过现实诠释成为解决当下问题的有效法则。

以朱熹为例，他批判俗儒、禅道之学而建构圣人之学，正是依靠“以自家之意迎取圣人之志”的以意逆志读书之法，这也正是把孟子特殊命题提升为方法论命题的经典建构。朱熹自我体认传统完成方法论建构的同时，通过传统命题的方法论提升实现经典建构。其经典命题的建构，一方面是朱子与孟子之间以问答展开的古今对话，另一方面是儒学应对外来佛学实现的中外融合。

(二) 伦理对话

为什么能够完成经典建构？以意逆志诠释学的内在理路是伦理对话。中国文化中对“以意逆志”这个具体命题的诠释史经验显现了伦理对话的理解法则。

所谓伦理对话首先表现为把文本理解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行为。

从孟子提出以意逆志命题，确定以心求心的理解方向开始，其后出现的多种诠释，如赵岐解文之法的以意逆志、朱熹读书之法的以意逆志、顾镇结合知人论世的以意逆志，都把理解文本命题作为自我与圣人之间的体认行为。在现代语境中，徐复观提出的以意逆志追溯体验，也是把文本理解作为一种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行为来看待。这种观念也在西方诠释学中显现，如施莱尔马赫强调理解的同情，伽达默尔提出的视域融合。但与它作为理解方法、作为存在的方法论本体论视野不同，中国文化始终关注其作为伦理的特质。

因此，历代论者诠释以意逆志命题，在内涵上注重的是对内在自我的约束而忽视对外在方法的依赖，在表达上强调的是自我身形心态的经验呈现而忽视理论建构与逻辑审视。

其次，以意逆志诠释学的伦理对话表现为理解文本是为了提升自我，达到获得他人之意调整内在自我的伦理效果。

以意逆志不是一种认识活动而是一种体认，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功夫。“对自身以外是客观事

物的对象,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加以处理、操运的,这是一般所说的方法。以自身为对象,尤其是以自身内在的精神为对象,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在人性论,则是为了达到潜伏着的生命根源、道德根源的呈现——而加内在的精神以处理、操运的,这才可谓工夫。”^{[21]410}

因此,以意逆志诠释学是一种传统学问的现代延伸,其学不是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分科之学、方法之学,而是中国传统意义中的求道之学、功夫之学。

与在西方文化主客分离的学术观念影响下,在真理与方法论域中建构的包括一般诠释学、哲学诠释学、批判诠释学以及中国古典诠释学等诠释学建构不同,以意逆志诠释学是在现代学术语境中,中国传统文化激发生成的关于理解的学问。它是在传统学术观念影响下,在自我与他者的伦理论域中建构的诠释学。它从伦理的角度审视理解问题,反思现代诠释学的伦理建构,追问自我与他者的终极伦理,将形成方法、本体、伦理多元框架的诠释学新格局。

参考文献:

- [1] 张海明. 回顾与反思[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2] 陈中凡. 中国文学批评史[M]. 上海:中华书局,1927.
- [3] 陈寅恪. 陈寅恪集[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4] 朱自清. 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M]//朱自清学术文化随笔.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 [5] 童庆炳. 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华古代文论[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 [6] 童庆炳.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7] 刘小枫. “误解”因“瞬时的理解”而称义[J]. 读书,2005(11):139-147.
- [8] 张伯伟.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9] 孟子. 孟子注疏[M]. 赵岐注,孙奭音义并疏. 十三经注疏本.
- [10] 朱熹. 朱子语类[M]. 黎靖得编,王星贤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1] 钱穆. 朱子学提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 [12] 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3] 顾镇. 虞东学诗[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4] 周裕锴. 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15] 顾颉刚. 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G]//古史辨:第3册. 北平:朴社,1931.
- [16] 徐复观. 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 [17] 徐复观. 中国文学精神[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 [18] 徐复观. 中国思想史论集[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 [19] 胡晓明. 重建中国文学的思想世界如何可能[J]. 文艺理论研究,2002(6):26-37.
- [20] 周光庆. 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21] 徐复观. 徐复观文集[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韩云波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Hermeneutics of the Theory of “Understanding by Heart”

YANG Hong-q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Hermeneutics of the Theory of “Understanding by Heart”, three hermeneutics stages——expanding the meaning, limiting the boundary and constructing the logic have developed. There are Chinese hermeneutics with “understanding by heart” in the historical hermeneutics of the theory of “understanding by heart”, which set up a classical model by the ethics dialogue.

Key words: the theory of “understanding by heart”, the history of hermeneutics, Chinese hermeneutics with “understanding by heart”